【编者按】萧山孕育出了无数的英豪贤人,在文化领域有大量彪炳史册、烛照乡里、惠泽后人的仁人志士、贤达才俊涌现。虽然他们的人生辉煌各不相同,但是印记却是相同的,他们共同构成了萧山深厚的人文传统。

忆名人往事,品萧山文化。在此,我们推出“萧山文化名人录”系列文章,从跨越千百年的生命维度中,从跌宕起伏的人生篇章里,感受先人的赤子热情,以及他们旷达不羁的艺术精神。

蔡东藩:一代史家,千秋神笔

●蔡东藩画像

■ 孙昌建/文

读小学时就读过蔡东藩的演义,是有慈禧有光绪的那一部,因为那个时候能看的书不多,能看懂的更少,我记得除了《三国演义》,还有就是蔡东藩写的演义,后来才知他的演义有很多部,等知道之后好像再也没有儿时读书的那种兴趣了,这才理解什么叫人生读书糊涂始。

再后来又知道他是杭州萧山人,偶尔我也会问起萧山的同学和朋友,但知道他能说上几句的还是很少,远不如画家任伯年等,这在传播史上也是一件比较奇葩的事情。

这么有名气这么有贡献的人就在身边,但我们却时常视之不见如同空气,当然这几年不一样了,听说他在临浦的故居也都已经修缮了,但我最近的一首诗还是写与他的“不遇”。

蔡东藩1877年生于萧山临浦,临浦曾属绍兴管辖,乡俗颇具越风。纵观他的一生,感觉到他过得比较苦,至少从他的家境来看是这样的。他父亲是镇上一家丝行的店员,收入微薄。蔡东藩6岁左右,就跟随两位哥哥读书。不久大哥去世,就靠二哥对他指导。二哥比他大四五岁,天资聪颖,学习认真,全家人的希望都寄托在二哥身上,可是不久二哥患了足疾,逐渐不会行走,再后来医治无效也早亡了,现在看来,还不是脚的病因。

这样不幸的事情相继落在蔡家,于是家里把全部希望寄托在了蔡东藩身上,可是这个时候蔡家已经越来越贫困了,于是他只好到富家为公子当“伴读”。这样,可以有机会听老师讲课,又不需学费,且还有伙食供应。伴读是一种很特殊的方式,人们很少研究这种方式。后来他又到他的二姐夫田沛鋆家里读书,14岁时他就和二姐夫田沛鋆一道去考秀才。

田沛鋆比蔡东藩大20岁左右,身体魁梧,而蔡东藩身材瘦小。考秀才需经过县考和府考,进考场人很拥挤。田沛鋆力大,双手挽着两只考篮,在前开路,腰中系着一根布带,叫蔡东藩拉住裤带,跟在后面。别人看起来好像父子同进考场那样。经过县考、府考后,蔡东藩和田沛鋆都考中,而蔡东藩的名次远远在二姐夫前面。

这次临浦考中秀才的有好几个,数蔡东藩的年龄最小,从此,他的名字就在附近传开了。

此后,蔡东藩经友人介绍,到杭州一满族人家做家庭教师。那家有两个儿子要他教学,大的年龄比他稍大,小的也与他差不多。全家人对他都比较尊敬。

前面说蔡东藩是秀才出身,那差不多可以说是末代秀才了。传闻他有神童的称号,自幼聪颖好学,因为儿时就在阅读《资治通鉴》。他于光绪十七年(1891)中秀才。宣统元年(1909)中省优贡生。1910年朝考以优入选,1911年春赴福建以知县候补。注意这已经是1911年了。

神童自有神童的厉害之处,蔡东藩最厉害的就是曾经当过“枪手”,科举时代的枪手。这个事情自有风险,但也有极大的诱惑,所以他更愿意铤而走险,而且他又做成功且小有名气了,但是报应也还是终于来了,而且极具讽刺意味。为什么这么说呢,因为他冒名替人家考竟然考中过,但是自己去考,却也有名落孙山的经历。原因竟然是学生孝敬老师的鸡汤溅了出来湿濡了试卷,这不是有意为难考官吗?结果可想而知,可见无论是佐餐的鸡汤还是心灵的鸡汤,都得小心才好,否则一碗鸡汤也会坏了大事的,不过好在蔡东藩觉得做老师也蛮好的,并不在意一时的落榜。

都知道1911年是辛亥年,10月10日的武昌起义推翻了清王朝,但蔡东藩也并不想给清朝殉葬,在这之前他已经辞官回到了家乡。辞官的原因大多说是不满官场的黑暗和腐败,这当然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说法,但就蔡东藩的个性而言,其实根本就不适合做大清国的公务员,或者说这个知县候补实在是太没意思了。一介书生回家卖不了红薯,于是只能回家卖文为生。

当时,蔡东藩有个同乡好友叫邵希雍,在上海谋事,写过一部《高等小学论说文范》,当时由上海会文堂新记书局出版,一时风行,邵希雍想趁热打铁续著《中等论说文范》,搞上一个系列,但他自己事情多了,不能潜心编著,于是就邀请蔡东藩来参加编撰。于是蔡东藩就开始走上卖文为生的道路了。那时适逢辛亥革命,对此他是举双手赞成的,这一点也体现在他为《中等论说文范》一书的自序中,他说:“窃谓为国民,当革奴隶性;为新国文,亦不可不革奴隶性。”“但能理正词纯,明白晓畅,以发挥新道德、新政治、新社会之精神,为新国民之先导足矣。”

《中等论说文范》虽不及《高等小学论说文范》那么有影响,但足以让蔡东藩在上海会文堂新记书局扎下了马盘,此后他为该书局编撰了《写信必读》《楹联大全》《留青别集》《幼学故事琼林续集》《客中消遣录》等书。这些书从书名看都是大众读物,因此发行量也都还可以,这就为他后面专业的“演义”写作铺好了道路,否则一开始就写长篇演义,那靠什么来养活自己和家人呢?

同时,蔡东藩在书局的编撰经历,也可以说是他文字生涯的试水阶段,就是试试看可不可以以此为生,做编辑不一定会写好文章,但一定是懂好文章的,正如好的小说编辑,不一定是优秀的小说家。如果蔡东藩就这样编辑当当,也可能是一名优秀的编辑,比如以后到商务印书馆或者哪里,这也有可能会做一名伯乐,但这样在文学史上就不会留下他的名字了。

蔡东藩写的历史演义,可谓煌煌巨作,几乎是涵盖了上下三千年,如果从内容来分,大致可分三类:

第一就是按照时间的经纬来写的,比如第一部是从秦始皇起,最后一部写到1920年,他一共写了2166年的事情。这是蔡东藩的主要作品,一共有十一部,分别是:《前汉通俗演义》(附秦朝)100回、《后汉通俗演义》(附三国)100回、《两晋通俗演义》100回、《南北史通俗演义》100回、《唐史通俗演义》100回、《五代史通俗演义》60回、《宋史通俗演义》100回、《元史通俗演义》60回、《明史通俗演义》100回、《清史通俗演义》100回、《民国通俗演义》120回(这一部另由萧山籍作家许廑夫续写了40回,计160回)共11部,1040回,字数600万左右。总的名称叫《中国历代通俗演义》。

但是这十一部书,蔡东藩并不是顺着朝代次序写的,他成书的次序是:一、清史,二、元史,三、明史,四、民国史,五、宋史,六、唐史,七、五代史,八、南北史,九、两晋史,十、前汉史,十一、后汉史。上海会文堂新记书局陆续印行这十一部演义,其中《清史通俗演义》最早,出版于1916年7月,《后汉通俗演义》最迟,出版于1926年9月,这可以说是十年磨十剑,开始印的都是有光纸石印插图本,当时这套书的发行量非常大。

从这十一部演义的写作和出版次序来看,并没有太多的规律可寻,不过就第一部而言,他的确是从近处开始写的,这即是《清史通俗演义》。这又是为什么呢,说白了还是作家试图用书籍影响生活,用演义干预时政。大家都知道辛亥革命以后,中华民国之初,风云多变,政局不稳,有不少人还是想复辟回到过去,蔡东藩作为一个文人,手无缚鸡之力,那只能指挥百万文字大军来唤起民众的共和民主意识。他当时曾说:“孰知时事忽变,帝制复活,筹安请愿之声,不绝于耳。几为鄙人所不及料。”事实上包括他的亲朋好友左邻右舍中都有顽固派的, 但他显然不为所动,而是坚定不移地与时俱进。

第二个类型,是他专门写过一部《西太后演义》或叫《慈禧太后演义》的,30万字左右,是1916年由上海会文堂书局出版。

第三是他增订了《历朝史演义》。这是清初新昌吕安世所著,这是从盘古开天辟地写起,一直写到清朝,字数50万字左右,此书由上海大东书局出版发行。

蔡东藩写作“演义”的十年生涯,可以说是披星戴月、呕心沥血,传闻他为了节省纸张,把字写得很小,这样一张纸可以放两三千字。蔡喜欢水烟,又舍不得用火柴,所以都是用纸捻来点火,招待客人,只能一根水烟枪轮流使。当时他用不起电灯,只能用油灯,他不留发,光头,戴深度近视镜,平时穿灰白色布长衫,他不用钢笔,随身带毛笔与墨盒,仅有一套西服只是结婚时穿过,平时多素食,甚至吃豆腐渣,夏天怕熏坏眼睛而不肯点蚊香,据说每天换下来的袜子上都是血迹斑斑。

蔡东藩的历史演义作品,既有史家观点,又有文学笔法,后人评价其是七分史观、三分文才。他的演义作品既可以当作历史著作来阅读,也可以当作文学作品来欣赏,这跟《说岳全传》一类的作品有相似之处,特别是他的作品老少皆宜,特别适合普罗大众阅读,比如我们年幼时就读他的书,虽然不完全看得懂,但也知其故事和人物,而且由此会对中国历史产生兴趣。

蔡东藩这些书当时的发行量极大,影响也很大,因为他照顾到了最广大的读者,可以说一时洛阳纸贵,本来作家也可以凭此既扬名立万又日收斗金,但事实上并非如此,包括此前跟他一直合作的上海会文堂书局也是不断压价,所以他曾拿过每月60元工资的工作“合同”,也有一部书的稿酬只有200元的报酬,虽然当时的200元也不是一个小数字,但跟他作品的一纸风靡的现象相比较,那付出和收获实在是太不成正比了。这个中间他遇到过很不靠谱的“经纪人”,也遇到过唯利是图又目光短浅的书商,因此蔡东藩并没有因书致富,相反他因长期写作而积劳成疾,再加上他的家庭生活不仅不幸福,而且还是“多灾多难”,前面所述,他的两个哥哥都早早地夭折了,随后父母也先后去世。接着他嫁在农村的三个姐姐,都因患肺病而相继死亡,她们没有一个生男育女像。

蔡东藩20多岁时,与一王姓的农家女子结为夫妻,育有二子。长子叫震濆,次子不满10岁患急病夭亡。这王氏与蔡东藩相处不几年,就故世了。后来,有个当地的黄姓名医看中蔡东藩,将其女许配给他。传闻此女子知书达理,能文善诗,平日夫妻同写诗文,互相切磋,蔡东藩还从她那里学到不少医学知识。黄氏曾生有一女,但好景不常,爱女突患重病,多方求医无效,不几日也夭折了。女死母哀,黄氏不久也就永别人世。这对蔡东藩来讲,是莫大的打击。此后,蔡东藩又与一韩姓店员之女结婚。这第三任妻子体质较差,平时多病,始终不孕。所以蔡东藩的子女仅存震濆一个,但震濆一向多病,后来蔡东藩就叫儿子到杭州中医专科学校求学,蔡自己也曾行医乡间,别人弃医从文,他则有弃文从医之愿,因为他的一家人都因病而故世,这一点跟俞曲园先生颇有相似之处,后来他还写成《内科临症歌诀》4卷,在乡间也办过私塾。

蔡东藩写作的黄金生涯,就在1916年至1926年的十年间,他的历史演义写作,“以正史为经,务求确凿,以轶闻为纬,不尚虚诬”,在体裁上突出“义以载事,即以道情”的特点,并且自写正文,自写批注,自写评述,这都堪称创举。蔡东藩一生共著书13部,撰写700余万字,篇幅之巨堪称历史演义的奇迹,因此被誉为“一代史家,千秋神笔”,这可以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,至少现在为止还是无人企及。

蔡东藩先生于1945年3月5日(日本投降前夕)逝世,享年六十九岁,蔡先生的后人仍有在萧山当地工作的,其孙蔡福源著有较为详细的回忆录,坊间也有传记《浮生若梦:蔡东藩传》,作者李保明。据查,蔡东藩没有一张照片留世,只有后人凭印象画的一幅画像存世。

(作者孙昌建系一级作家、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、浙江省作家协会诗歌委员会主任、杭州市作家协会副主席、杭州文史研究馆馆员,出版文学和文史作品三十余种。)

西湖审美价值的横向比较

▶▶▶[紧接A1]

与有的地方某一方面的文化积淀比较突出,其他则相对比较单薄形成了鲜明的对照。陈同滨教授在申遗文本中例举了西湖的佛道文化、忠孝文化、儒家文化、隐逸文化、藏书文化、金石文化,茶文化等等,几乎都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。集中体现了中国传统人文领域的丰富性和多样性。它们门类多,涵盖面广,历史悠久,源远流长,大都具有全国性的价值和意义。譬如岳飞、于谦、张苍水、秋瑾这样的爱国主义、英雄主义,白居易苏东坡的西湖诗词创作,林和靖的隐逸生活,文澜阁的藏书文化,西冷印社的篆刻书画艺术,都在各自的领域里占据着特别重要的一席之地。甚至起着引领的作用。用一句时髦的话说,它属于比较高光的那一块。它们以物质的和非物质的遗产形式存续于西湖的山水之间,与湖山融为一体,千百年来一直在影响中国人思维方式、生活方式和精神生活。

在表现形式上,西湖所蕴含的中国传统人文精神,总体上说,是以综合性的、开放性、世俗化,以老百姓的喜怒哀乐为依归的面目出现的。所以深受人们喜爱。西湖的人文景点一般体量不大,建筑历史并不久远,而且也没有什么使人眼睛一亮的镇馆之宝。但人们还是特别喜欢它,因为它因地制宜,在布局和体量上和西湖山水融为一体,充分发挥青山绿水、自然景物对人文精神的映衬和烘托作用。透露出浓浓的中国特色、中国情怀,体现出中国文化最精髓部分的本色。近年来建设起来的各类纪念馆、故居也继承了这一传统。人们一边游览,一边接受中国人文精神的熏陶,给人以很大的回味和联想空间。

另一个体现中国人文精神之美的例子是遍布西湖各处寺庙、祠堂、亭子、景点的楹联。西湖楹联的特点,是多元一体,雅俗共赏。不是那种空泛、教条式的宣教,不是搞文字游戏,它很直白,只要认识汉字就能读懂,却能画龙点睛地表达出传统文化优秀的思想精髓:它们之中有表达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的,有强烈抒发忠贞的爱国主义情怀的,有对美好生活的执着追求的,有表现对真善美的向往和追求的等等,互为补充,互相包容,生动活泼。以普适性来满足各类人群的心理需要。最著名的如岳庙的名联:“青山有幸埋忠骨,白铁无辜铸佞臣”“正邪自古同冰炭,毁誉于今判伪真”两联,凝结着沉重的兴亡感,沧桑感、使命感。曾经激励过多少仁人志士在危难之际,为国家、民族的命运而奔走、而牺牲。

接受中国传统的人文精神的方式多种多样,但在特定的时空环境中实地凭吊,与坐在书房里读书的感觉大不一样。坐在书房里读书,主要靠梳理历史事实,重在逻辑分析,通过思辨推理来增加见识,而徜徉在秀色可餐的湖山之间,把个体的审美活动和先贤们的遗迹遗物联系起来,这就是我们常常说的“感悟”。什么是感悟?感悟“既非理智认识,又不是不认识,而是一种不可言说的领悟、感受”。特定的历史氛围可以使人把家国情怀、历史责任、个人抱负紧紧地联系在一起,让你流露自己深沉醇厚的情感,让你可以抒发自己的心志,寄托自己的意绪,从中寻找前行的力量,这是世世代代中国人(特别是读书人)生命的底色。从这个意义上说,西湖是最容易让中国人领略人文精神“感悟”价值的一块胜地。它不愧是一部中国传统人文精神的教科书。

所以我一直坚持认为:在历史上,如果说,中国人皇权崇拜的圣地是北京紫荆城,思想信仰崇拜的圣地是山东邹鲁的孔孟故里,宗教崇拜的圣地是四大佛教名山,那么,审美崇拜的圣地就是杭州西湖。

要说西湖有什么过人之处的话,这就是它的过人之处。

(作者系杭州市西湖申报世界遗产专家组组长)